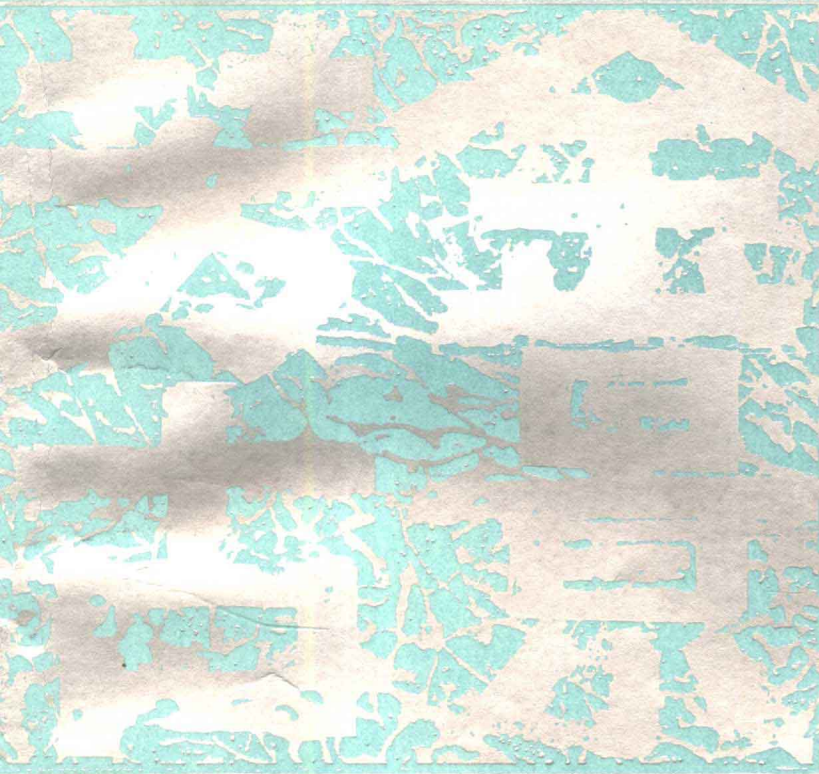


金景芳古史論集





金景芳古史論集

金景芳古史论集

责任编辑：黄曼萍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东中华路29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粮食系统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991年7月第1版

印张：10.875 插页：4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271千字

印数：1—1 300册

ISBN 7-5601-0895-4/K·25

定价：2.85元

目 录

孔子与现代化	(1)
孔子所讲的仁义有没有超时代意义?	(3)
论孔子思想的两个核心	(13)
孔子的天道观与人性论	(30)
研究中国古史必须承继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36)
孔子对《周易》的伟大贡献	(57)
《周易讲座》序	(74)
《周易全解》序	(37)
经学与史学	(98)
孔子与六经	(113)
孔子的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六经	(134)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讷言发覆	(186)
《周礼》	(191)
《周礼》与《王制》封国之制平议	(199)
古籍考证五则	(211)
中国古代思想的渊源	(218)
中国奴隶社会诞生和上升时期的思想	(239)
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制社会的科学概念	
与中国古代史分期	(293)
金毓黻传略	(306)
治学二题：读书和科研	(315)

附 录：

1. 历史学家金景芳的治学道路…………… (321)
2. 金景芳教授学术思想述要…………… (331)
3. 金景芳教授论著目录…………… (340)

孔子与现代化

谈孔子与现代化，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五四”及其以后长时期批孔，而今天却大张旗鼓地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到底谁对谁不对，是批对，还是纪念对呢？我说都对。原因是时代不同了。前此是革命年代，战争年代，而今天是和平年代，建设年代，好似冬衣裘，夏衣葛，没有什么奇怪的。人们所以迷惑不解，过在不学历史，或学历史，而不能心知其意。如果学历史，又心知其意，就会看到，不只“五四”时期批孔，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批孔。不过，须注意，批孔总是在战乱年代。我举一个例子。《史记·酈生、陆贾列传》说：“沛公（刘邦）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证明刘邦在楚汉相争时，就是批孔的。然而在取得政权以后就不同了，竟由批孔而变成“过鲁以太牢祠孔子”（《史记·孔子世家》）了。再举战国时期的事实作为一个例子。当时天下大乱，百家争鸣，道、墨、法诸家没有不批孔的。《庄子·天运》有一段话，最能说到问题的本质。它说：“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斡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庄子这段话就是说，孔子行西周和平时期之道于鲁国战乱时期，是犹推舟于陆，不但行不通，还会有灾害的。《孟子·滕文公下》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我看符合真理。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一治一乱，交替进

行。应用辩证法的规律来说，一治相当于量变、一乱相当于质变。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治世尚文，乱世尚武”，我看是对的。今日中国正是革命已取得胜利，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孔子，自然应予以重视了。

孔子是古代人，与现代化相提并论，不矛盾吗？我说不矛盾。问题在对孔子和现代化二者作如何理解。我认为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正确的理解应当是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进而走向共产主义。实现国防等四个现代化，固然重要，但它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大家知道，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第一，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第二，必须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就不能不牵涉到孔子了。因为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严格说，中国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孔子思想的烙印。那么什么是孔子思想呢？我认为简单说就是仁义。这从孔子的反对派道家庄子，主要攻击仁义，并诡称孔子自己说过他的学问“要在仁义”（《庄子·天道》可为证明。什么是仁义呢？简单说，仁是指人要相亲相爱，以父母与子女之爱为出发点，进而推广于全人类。义是指社会要有安宁秩序，它是承认人类在心理上生理上有差别性，因而作了适当的合理的处置。想了解它们，不必旁征博引，目前我国对内制定的达到温饱、小康、中等发达国家的计划，就属仁的范围，要求安定团结，就属义的范围，对外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和平共处，就是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观点的具体运用。

（《书林》1990年第3期）

孔子所讲的仁义 有没有超时代意义？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有人说是仁，有人说是礼。据我看，这两种说法都不全对，也不全错。正确地说应该是仁义。我之所以这样说，有两条根据。第一条是《庄子天道》有“孔子曰：‘要在仁义’”。当然，《庄·子》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这句话不必真正出于孔子之口，但是，说它是当日学术界的共同看法，可无疑义。否则庄子是不会这样说的。第二条是《易·说卦传》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当然，这句话是孔子说明《易经》中的卦的，不能就看作是孔子自己的观点。不过，这同孔子贵时、贵中一样，孔子思想肯定是受《易经》思想的影响。不然，说孔子思想与《易经》思想暗合，亦未为不可。

孔子言论，今日还流传于当世的，应首推《论语》。在《论语》一书中，谈仁的地方很多，谈义的地方也不少。但是，什么是仁义呢？却不见有正面地详尽地阐述。如果说有，那就是在《礼记·中庸》中。在《中庸》里，有孔子回答“哀公问政”一段话。在这一段话里，孔子曾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据我理解，这段话是孔子对仁义及礼的定义及其相互关系所作的最全面、最精确的阐释。考虑到由于时代关系，今日很多人已不能理解，兹略为诠释如下。

“仁者人也”，这个“人”字，据我看，有两层意思。第一

层是说仁是在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中产生的。第二层是说仁的适用范围只限于人类。

《孟子·尽心上》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亲亲仁也。”这是“人”有第一层意思的证明。《吕氏春秋·爱类》说：“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这是“人”有第二层意思的证明。

“亲亲为大”，据我看，也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说亲亲是仁，第二层是说“亲亲”是仁之中最大的、首要的。它意味着仁不以“亲亲”为限，要把“亲亲”这个仁推广于全人类。

“义者宜也”的“宜”是恰当、合理。这个恰当、合理表明它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标准，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物制宜。《孟子·滕文公上》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所以“宜”正是由于事物千差万别，不能一例看待，而应分别作符合实际的处理。《论语·颜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宜，反之，就是不宜，亦即不义。

“尊贤为大”，据我看，也有两层意思。第一层说“尊贤”是义。同时表明“义”不同于“亲亲”，主要适用于“亲亲”而外的人们。第二层说“尊贤”是“义”中之大者。“义”的范围很广，不以尊贤为限。《礼记·丧服四制》说“门内之治恩揆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这是“尊贤为大”有第一层意思的证明。《礼记·仲尼燕居》说：“目巧之室则有奥阼，席则有上下，车则有左右，行则有随，立则有序，古之义也。”这是“尊贤为大”有第二层意思的证明。

“亲亲之杀”是说“亲亲”是有等级差别的。《礼记·丧服小记》说：“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这段话可看作是“亲亲之杀”的注脚。郑玄注说。“已上亲父，下亲子，三也。以父亲祖，以子亲孙，五也。以祖亲高祖，以孙亲玄孙，九也。杀谓亲益疎者，服之则轻。”郑说是对的。

“尊贤之等”是说“尊贤”也有等级差别。《左传》庄公十八年说：“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这是“尊贤”有等级差别的具体例子。

“礼所生也”，是说“礼”不是别的，它就是由仁的“亲亲之杀”和义的“尊贤之等”产生出来的。“礼”就是依据仁的“亲亲之杀”和义的“尊贤之等”所作的具体规定。因此，也可以说礼是以仁义为内容的一种表现形式。既然如此，所以有人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也不见得不对。

孔子生在春秋后期。孔子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也同其它思想家一样，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谈到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个题目很大，我们不能详细地谈，只能就当时历史的基本特点谈一谈。据我了解，春秋是处在中国奴隶社会的衰落时期。过去如果说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时已降而为“自诸侯出”，更降而为“自大夫出”，以至于“陪臣执国命”。也就是说，这时中国奴隶社会不断走下坡路，已达到礼坏乐崩的地步。从孔子一生的政治立场来看，显然他不是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努力去变革旧社会，缔造新社会，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梦想回到西周之初，即回到中国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因此，我们研究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要考虑春秋时期的历史条件，也不能不联系到中国奴隶社会全盛时期的历史条件来考察。据我了解，中国奴隶社会全盛时期的历史条件，基本上有两个特点：一、阶级关系居于主导地位；二、血族关系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还具有强大力量，尽管已降居次要地位。恩格

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说：“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①根据恩格斯这条理论的指导，可以知道中国奴隶社会的产生是有它的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的。它的前提无疑是原始社会，它的条件应当说就是新产生的国家。恩格斯告诉我们，“原始社会是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②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③这样，我们说中国奴隶社会的历史条件基本上有两个特点。其一是阶级关系居于主导地位；其二是血族关系已降居次要地位，但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还具有强大力量，是符合实际的，合乎逻辑的。正由于中国奴隶社会的历史条件是这样，所以，孔子的思想以仁义为核心是毫不奇怪的。

应当指出，孔子所讲的仁，实质上是反映当时存在的血族关系；孔子所讲的义，实质上是反映当时存在的阶级关系。仁的亲亲为大，义的尊贤为大，就是它们在实质上反映当时存在的这种关系的确凿证据。不仅如此，《左传》隐公四年说：“大义灭亲”。《公羊传》哀公三年说：“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证明在当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确是阶级关系，而不是血族关系。

从上文一路论证，可以看出，孔子所讲的仁义有时代性，在它们的上面有阶级的烙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们有没超时代意义呢？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必须回答。我的意见是“有”。理由如下。

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既有时代性，又有超时代性，二者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1页。

②同上书，第21卷，第30页。

③同上，第200页。

是统一的，缺一不可。没有时代性，历史不能发展，没有超时代性，历史也不能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历史是以新陈代谢的方式不断推向前进的。没有新的代替旧的，历史当然不能向前发展。但是如果在旧的当中没有可以继承的东西，则进入新的一代势必一切都从头做起，好象熊掰苞米一样，掰取一个，又丢掉一个，最后剩下的还是一个，这样，历史也是不会向前发展的。

现今，有一大批人由于痛恨封建思想之为害，而迁怒于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以为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必须否定旧的传统。他们把新与旧看成是绝对对立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封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个东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固然有封建的因素，但也有非封建的因素，它正是时代性与超时代性的统一。

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子思想为例来说吧。孔子思想以仁义为核心。孔子讲仁义，强调亲亲尊尊，不可否认，它有时代性。不然，为什么在战国法家出现以后，司马谈撰《论六家要指》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呢？这就说明代表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不同意孔子的思想，亲亲尊尊在奴隶社会适用，在封建社会就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不能因此就说仁义没有超时代意义。

恩格斯说：“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①据我理解，恩格斯这一段话是说，历史上劳动的发展阶段不同，而劳动亦即生活资料的生产是始终存在的；家庭的发展阶段不同，而家庭亦即人类自身的生产是始终存在的。根据恩格斯上述理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页。

论，我们就可以断言，孔子所讲的仁义，不仅有时代性，也应有超时代性。因为阶级是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阶级是要消灭的。而作为两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则不能消灭，而是要长期存在的。

《礼记·礼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告子上》说：“食色，性也。”我国古人有这种说法，我们当然不能理解为他们已经懂得两种生产的理论。但是，如果说这两种说法与恩格斯两种生产的理论一致，或不相违背，还是可以的。总之，我看这是一条真理。因为人总是要吃饭的，不吃饭就要饿死。人还是要生小孩的，不生小孩就会绝种。要吃饭不劳动不行，不管是由谁来劳动。生小孩就产生了家庭，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有家庭，有劳动，就如恩格斯所说在它们的发展阶段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人们生活在这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遇到应当处理上述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应采取的手段，或者说道德标准呢？我看是有。大体上说不外两种：有的是主张利己，有的是主张利他；有的重利，有的重义，因而有的喜争，有的喜让。其实，二者是对立的统一，绝对地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是不可能的。然而只特别强调某一方的事实，却是存在的。例如，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崇尚仁义，而西方就不同，他们崇尚个人主义。那末，这两种手段哪一种好呢？这是当前国内学术界正在争论的一个大问题。据我看，两种手段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而不应该是此非彼，互相攻难。应当知道，中西两方的文化，都是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即以中国而论，不仅在崇尚仁义这一点上，其它如文字、医药、天文、历法、音乐、建筑、乃至诗词、书法、绘画等等，以至写字所用的笔，吃饭所用的筷子，都与西方不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用自己的头脑，经过长期的年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我们的祖先正赖有此，才能在过去几千艰苦历史舞

台上称为先进，以至今日还是一个拥有11亿人口，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国家。我们落后挨打，只是最近一个多世纪的事情。为了摆脱落后挨打的处境，我们只应发愤图强，一方面向打我们的人作斗争，另方面向比我们先进的人学习。而不应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我们的祖先身上，把我们祖先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中国和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在长期独立发展中，形成了各自传统的文化。从各自的历史来看，都有过兴旺时期，有过衰微时期，都经历过顺利和曲折，总之，都有长处，也都有短处。只根据一时的得失，就作出全称肯定或否定的判断，是欠妥的。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再审视一下孔子所讲的仁义。孔子所讲的仁，无疑是“汎爱众”，然而他并不主张“专门利人，毫不利己”。他是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他总是以一己的好恶为取舍的标准，以推及别人。所以，说他是个人主义者当然不对，说他“无己”“忘我”，也不对。有人问他“以德报怨，何如？”他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这正是孔子哲学的特点。孔子所讲的仁，是从“亲亲”开始的。他说“亲亲为大”嘛！其理论如《仪礼·丧服传》所说：“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体也。”既然是一体，焉得不亲。关于夫妻的关系，古礼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礼记·昏义》说：“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醕，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另一种是《礼记·丧服四制》说：“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见无二尊也。”我认为，这两种说法的前一种是纯粹的仁，后一种里边已渗透进义来。或者说前一种说法反映原始社会时期的情况，后一种说法反映文明社会出现以后的情况。恩格斯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

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来性质。”^①由此可见，在个体婚制下出现的夫尊妻卑，有历史的必然性，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说，只要这个社会制度还有生命力，就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改变的。

关于亲亲而外的仁，《孟子·梁惠王上》讲的比较充分。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关于义的实质与应用，《荀子·王制》讲的最为精辟：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又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荀子这段话的大意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是说义的产生，不在于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原始社会，而在于国家出现以后。这一点与《礼记·礼运》把“礼义以为纪”列于“天下为家”之后和《易·序卦传》说：“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二是说制礼义的目的是为了防乱，即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78页

用礼义来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他是认识到社会的人无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是有差别的。义就是按照这些差别的具体情况，而作适当的符合实际的安排。《中庸》所说的“义者宜也”，就是这个意思。第三他认为义是人类区别于生物和无生物的标志或特点。

综上所述，可知相亲相爱就是仁，遵纪守法就是义。没有仁，人类将不能存在和发展。没有义，社会想存在和发展，恐怕也不可能。因为，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等级还要存在的。

今人向西方学习，每盛赞“个人主义”，盛赞“自由、平等”，而否定仁义。我殊不以为然。我认为“个人主义”对于反对依附，培育独立人格，确实具有好的一面。报载一些西方国家首脑的子女，都独立生活，不依靠父母，博得世人称赞，就是一例。不过，个人和集体是对立的统一。个人脱离集体，蔑视团结互助，在很多情况下，是行不通的。“自由、平等”大体上说，也是这样。自由是为了反对不自由，平等是为了反对不平等。当阶级统治肆虐，压迫剥削加剧的时候，提出这等口号，对于动员群众，壮大革命队伍，曾是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当阶级斗争缓解，社会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如果不强调纪律而片面地强调自由，就不免侵犯他人的自由；如果不提差别，而片面地强调平等，就不免重蹈平均主义的复辙。

反之，我们看孔子所讲的仁义，在战争年代，固然多“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然而从积极意义来说，它不仅有时代性，并且有超时代性。我看，无论到什么时候，如果真正能够行仁，使人人亲如兄弟，如果真正能够行义，使社会实现安宁秩序，有什么不好呢？听说近年来亚洲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如南朝鲜、新加坡，有提倡新儒学之事，显然他们是认识到儒学的好处。作为儒学发源地的中国，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向西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应该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我们正由于缺少这些东西，才落得个落后挨打。我们不愿意落后挨打，怎能不学习这些东西？不过，我们有一个取舍的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真理，是不是有益于人民，而不是什么中或西，新或旧。

今日我们中国已经站起来了。现正在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乃竟有人丧失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用民族虚无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很不应该的。

（《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